

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用利益来衡量一切,比如说,某人在讲坛上讲三国出了名,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如何讲得好,而是赚了多少钱,于是会有人试图去讲另一个东西赚钱,从老子到庄子都会试遍。那些想着各种办法打入艺术娱乐圈的人也是如此,或者送钱,或者送身体,目的不是多么爱艺术,而是想象着成为大腕明星,金钱在闪光而已。于是,艺术人文本身也在堕落,那些吸引眼球的招会层出不穷,从下半身写作到稀奇古怪的行为艺术,再到俗不可耐的一些所谓小品。

去年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与审美文化有关的话题:有“90后”女大学生提出,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革命年代的经典歌剧《白毛女》被如此解读,一时舆论哗然。这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下价值选择的问题,说明以“物欲症”为特征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人心和谐的精神因素。想一想那些成为阶下囚的贪官,还有那些善良而生活在重压之下的房奴、车奴、卡奴,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物欲症”的牺牲品吗?更重要的是,此话题从另一方面说明审美文化逐渐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其独立意义,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心灵对它的需要,而是用身体来衡量艺术,把艺术作为一个生活事实来对待。《白毛女》作为一个生活事实,喜儿面对富豪黄世仁,当然可以选择嫁给他,这样不仅可以挽救自己的父亲,而且还可以享尽豪华。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经典文艺作品都可以这样通过“现实化”的身体衡量而被解构:哈姆雷特可以忍受着丧父之痛而等待继承王位,贾宝玉可以权衡利弊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路,甚至,屈原也不必“吾将上下而求索”,何必为爱国而丢官呢,最后不是天下归于秦吗?这样一来,避免了多少悲剧的出现,也省得让读者去耗时间。只是,艺术人文的多米诺骨牌就彻底倒掉了。

全按照生活逻辑来运行了,便不再有什么东西来震撼我们的心灵:《白毛女》中喜儿宁肯到深山老林中去受苦难,也不愿嫁给黄世仁,除去阶级反抗的意义外,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其价值就在于表达了人类心灵对伟大崇高、对真挚赤诚的向往:宁死不屈以抗拒邪恶,艰难守望以追求真正的爱情。如果剧中的喜儿嫁给了黄世仁,那么《白毛女》就不可能存在了,人们便丧失了一次心灵洗礼的机会。实际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红楼梦》这些经典的价值都在此。

当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体快乐即可,何必去经受心灵的磨难时,艺术人文的传统功能就消失了,它不再面向精神世界,只面向身体本身——眼睛是身体衡量的代表,最后的结果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低俗文化必然大行其道。

放眼世界,会发现艺术人文对人灵魂构建的意义,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性的问题。20世纪以降,随着工具理性扩张,物欲主义泛滥成灾,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其《科学时代的理性》(1981年英文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中文版)中寻求人的精神解救之道,他在哲学与艺术的比较中寄

艺术人文的拯救问题

□黄力之

希望于后者。他认为,不只是物欲主义在形而下方面控制了人类,而且还将危险引向形而上方面,因为“哲学旧有的任务”正在于将人的独特体验、人的自我认识从自然本体论中挖掘出来,“越来越多地转向科学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屈从于科技的哲学只认领了一个任务:崇拜科技偶像,证明工具理性的无限力量。这样,哲学只能加剧人类退化与科技发展这个悖论的存在,不能使人走出“人类历史的最后期限”。

“苏格拉底认为,对于那些时刻感到压力的从业者来说,如律师、政策制定者、抵押贷款经纪人和对冲基金经理,总是会被迫‘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诡辩的律师肯定会成功、变得富有,也极会甜言蜜语,但他的灵魂微不足道、精明但却卑鄙。哲学家与之刚好相反,由于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世界,有着甘愿‘落伍’和看起来愚蠢的能力,他们自由着”(2010年5月21日《青年参考》)。

但伽达默尔不这么乐观,他认为哲学的工具化已经使得自身无可救药了,人欲拯救自己的精神,还是要请艺术出场,甚至让艺术去帮哲学的忙,即“艺术加入了世界观哲学的队伍”。他的选择是:将艺术本体论化。他相信,如果柏拉图还在,一定不会再主张烧毁诗歌,而“会以各种方式证明艺术存在的真实性”。他对此非常自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发现19、20世纪的文学巨著,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文化时代的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更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并把它们视为哲学伟大遗产的保存者”(《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29页)。

伽达默尔的意思是,既然哲学愿意将自己工具化,那么,艺术只好单独承担人的价值构建、确认自我的任务,艺术人成为人类最后的精神领地。此一用,当然无法用金钱来评估。对一些个体来说,它似乎无用,但对人类来说,其用大矣。

应该庆幸不断有人认识到这一点。2009年9月,哈佛大学出台新的通识教育方案,规定了八大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人文学科,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在强调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时,却单单点出了人文学科:“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这对艺术人文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在技术主义统治的世界里,终于又有人来关注灵魂的救赎了。哈佛的新政可以溯源于美国学界近年的争论。2008年1月6日,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的文章,质疑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中的观点:如果“Z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文学才能帮我们去解决压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只有文学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性危机”。

费什如此质疑科隆曼的观点:

“现世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超越的欲望。”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受到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售灵魂的故事后,再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费什说,“上述观念很好,但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在反对它。”“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45年)的一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分子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费什指出:“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心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参阅:郭英剑:《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谁站出来辩护?》,《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28日)显然,哈佛没有理会费什的观点,坚定地支持了艺术与人文。

又是美国人,耶鲁大学法语系主任霍华德·布洛赫(Howard Bloch)持“某些经典改变了世界”的观点,这些经典包括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左拉的《我控诉》等,理由是“所有这些伟大和持久的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的特别视角:我们的

激情和罪恶、我们的欲望对象、我们实现目标的策略、我们的幻觉和最真实的洞察力、我们最原始的感情和最高贵的理想等。经典记录了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最基本法则,是让我们从中寻找认识世界和与世界协商的实际知识的最肥沃土壤”。

的确,经典中“认识人类的特别视角”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人类在认识和感受到那些“激情和罪恶”、“欲望对象与目标的策略”带来好处,也带来人性退化的恶果时,终而学会了用“最高贵的理想”来制约“最原始的感情”,灵魂得以拯救。这一过程,便集中存在于人文艺术之中。

必须坚信,面对真正的人文经典,以及那些最后的传道者,人心还是会受到震动的,灵魂还是会质疑俗世的惟一性的,恰如黑格尔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演讲中所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向勇敢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

回望现实,精神的闪光隐约可见:北京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李家声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文学经典,然后传道于他的学生,让学生的心灵充满着人性的温馨。

李家声的学生李赛,北京四中的毕业生,现在在美国新泽西上学。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自愿从新泽西飞到灾区,加入到一支志愿者救援队,与同伴先后救出7位幸存者。后来,在谈到为什么一定要从美国飞回来时,李赛提及了自己的语文老师李家声。

高中语文课,李赛印象最深的是李家声讲《离骚》:“感觉讲台上的先生,好像被屈原附体一样,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芒,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感动。”

《离骚》是李家声最喜欢的古诗词之一,不知读过多少遍。对好多诗句,有深刻的体悟。因为屈原《涉江》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之句,有年暑假,他冒着高原反应之苦,特地到了青海格尔木,去直面巍峨雄浑、白雪覆盖的昆仑山,感受着诗中的意境。

李赛回忆着:“先生朗读《离骚》,时而激扬、时而悲愤。他给我们描述屈原与江边老人对话时,感觉屈原就在这里,就站在教室里一样。”

“像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正是追星的年龄,很容易被面部、服饰等表面的美所吸引。但是那会儿,我是被屈原的画像,搁在相框里。我被屈原那种灵魂的美、精神的美,所深深地吸引。”(《师说》,《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16日)

让我们记住这一幕吧,人毕竟是人。

理论
观察

海派清口与喜剧的疆界

□王丽丽

他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夹,撑起了一台“海派清口”表演。他西装笔挺,亦庄亦谐,融传统的单口相声、滑稽戏等多种表演形式于一身,针砭时弊,纵览风云,这个人就是周立波。周立波借着世博的东风,把自己打造成城市文化名片。在对时事的调侃与嬉笑怒骂之间,对中国的曲艺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上海有句老话:“噱头噱只头,蹩脚蹩只脚”。周立波深知其中要义,一头一脚做得十分到位,可谓用足了心思。

油光可鉴的小分头,一双锃亮的漆皮皮鞋,是上海男人的经典符号。再配上上海滩的背景音乐,一出场就营造出海派文化的精致、优雅,继续着对往昔繁华和未来梦想的追恋与想象。“海派”一词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海派”一出现便含有贬谪之意。鲁迅称:“‘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由于它的商业化、世俗化与正统文学背道而驰,所以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艺界掀起

了“为海派正名”的热潮,海派文化的正面价值和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面对城市文化身份的缺失,积极突围,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态话语,周立波便应运而生。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无疑满足了上海日益高涨的本土意识,也使之成为海派文化的代言人。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写就了上海的传奇。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近代崛起的都市,作为鸦片战争失败、国门洞开之后的一种历史馈赠品,在结束了渔港小镇的封闭历史后,拉开了“十里洋场”的帷幕。在欧风美雨的浸染下,上海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海派文化是建筑在乡土世界上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都市文化,其间杂糅传统与现代的因素,既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也有市民文化的狭隘。海派文化透露出浓重的商业消费主义情结,推崇新事物,讲求享乐的同时,也渗透着精打细算的生活理念。在《笑侃大上海》中,周立波客观地梳理了海派文化形成的原因。其中以戏谑的方式展示了吴越文化的绵软与阴柔,苏北人的自卑与韧性,宁波人的精明与算计……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芯子”。尤其是上海的弄堂,是上海民生地图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海人习惯的地标,岁月流逝的一份小小的马表。弄堂,在穿进穿出中,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正如王安忆所说:“上海是世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优雅。”而正是这种民间市井的细密韧性,才是上海在寂

寞和困顿中有声有色的延续下去的历史根基。在《笑侃三十年》中,周立波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寻找上海都会30年来的生活变迁,其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勾起了几代上海人五味杂陈的回忆。在以怀旧为主基调,“意识流”式的随意调侃中,勾勒出大时代的侧影。并将人们引向感恩,因为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海派清口”持续火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它跟踪社会热点,针砭时弊,反讽生活,贯穿了表面戏谑而内里严峻的通透态度。在《壹周·立波秀》中,周立波以脱口秀的方式对热点时事进行趣谈盘点,如重庆打黑、中国足球、楼市涨跌、金融风暴……都有所涉猎。他讽刺赝品,揶揄统计数据,调侃大牌明星,开涮股市楼市,笑侃之后,也融入了严肃的社会思考。应该说,周立波站在平民的视角演绎了时事政治,表达了人们渴望参与民主政治的诉求。同时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也有独到见解:“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讲。这就是老百姓最平实的理想社会,也是我们一直不懈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对时事的热衷,显然与我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的社会结构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我国转型社会发展起来的中产阶层,基于财富积累的艰辛和经济稳定的渴望,对所有权带来的激情表现得尤为坚定和执拗,在一个个通往“经济人”的道路上,他们经营着财富,也实践着个体价值。对财经和股市的盘点,周立波辛辣地讽刺了股民的盲从、躁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道出了回归生活本真,把握当下幸福,平淡是真的人生真谛。

“海派清口”就艺术而言,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产物。它脱胎于香港的“栋笃笑”,同时又和上海的滑稽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吸收了北京单口相声的表演精华,讲求用“说学逗唱”制造笑料,同时又融入了脱口秀、音乐、舞蹈等多种现代元素,最大化地制造轰动效应。

周立波的表演,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喜剧无疆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虽然立足于上海,但是所谈论的话题早已超出了地域的自我限制,放眼全国,辐射世界。周立波本想从上海寻找精神自信,寻找集体自豪感,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以贬低北方文化为蓝本,以“大蒜”和“咖啡”,“拉面”和“阳春面”进行对比,凸显上海十里洋场的华贵之气,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周立波说,“海派文化就是用来被别人欣赏和嫉妒的”。海派文化中西化的部分,不能成为上海人轻视其他地域文化的理由,否则就会在对西方文化不甚良莠的顶礼膜拜的同时,沦为虚无的后殖民。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上海市民文化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文化自省,而不是对这一文化狭隘部分的集体认同。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一种大胸怀和大智慧。其实,无论是赵本山、小沈阳、郭德纲,抑或是周立波,他们都来自民间,尽管表演风格各异,而人们总喜欢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品头论足,实际上当一种文化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话语上的共振之后,它自然会打破文化差异,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

百年雪垠 千秋文名

□曾庆江 姚伦

为了纪念姚雪垠这位中国20世纪文学大家,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南阳市委宣传部、河南黄河文化基金会以及南阳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姚雪垠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6届年会”,于近日在河南南阳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八十余名专家学者根据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生庆(华中师范大学)在开幕词中强调,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彰显姚雪垠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卓越贡献,弘扬他的崇高人格精神。姚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贡献是卓越的,多方位的。姚老在做人上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即始终坚持对真理、对事业、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从不言弃。同时,已经成立30年、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新文学学会,是由姚老创立并亲自担任第一任会长,他对学会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熊元义(文艺报社)以姚雪垠与茅盾围绕《李自成》的创作和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通信为视点,指出其美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成为当代中国美学转型的前奏,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深入,二是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入。同时,从姚雪垠身上还可以看出作家接受批评的雅量,他不仅重视茅盾的文学批评,而且努力推动这种科学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而这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前提。金雅(杭州师范大学)从中国气派与艺术创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变化均衡与朴素生动等几个方面梳理了姚雪垠小说的美学思想,认为他对艺术民族根基的坚守、对艺术真情真性的重视等在今天仍能给人诸多启示。

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讨论是这次

会议的重要内容。严家炎(北京大学)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其一,姚雪垠非常注意处理好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关系,主张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史实为骨架进行艺术虚构;其二,悲剧艺术的出色运用是小说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标志,作品在忠于历史本来面目基础上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大悲剧的壮丽图画;其三,在结构艺术上,能够在多线索的复式发展中做到主次分明、虚实得体、统筹兼顾、繁而不乱。蒋守谦(中国社科院)将同取材于李自成起义的小说《永昌演义》与《李自成》进行了比较阅读,认为两书作者因历史观的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写作境界和作品质地,因审美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和作品体式,因此前者只能算是一部产生于现代的“古代小说”,而《李自成》则率先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而且还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座无可掩映其光辉的丰碑。董之林(中国社科院)认为,《李自成》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中既有关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语境和社会规范,又有小说艺术和历史叙事的独到之处。阎浩岗(北京大学)认为,《李自成》在小说艺术方面有许多开创性贡献:作者追求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实现了塑造人物性格与描述历史事件、展现历史风貌、揭示历史规律,全景展示时代风云与细腻描写日常生活情景的有机结合。它在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上达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高峰,在世界小说史上也独树一帜。姚老之子、姚雪垠研究会会长姚海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表示将与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姚雪垠研究会为平台,将姚雪垠研究更深入地进行下去。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华中师范大学)回顾了中国新文学学会走过的30年发展历程,特别回忆了姚雪垠对学会的筹建、成立以及发展壮大所做的各项工作,认为姚老不愧为“文坛巨匠,青年导师”。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还有舒信波、熊德彪、古远清、王万森、王又平、聂振强、王保生、崔志远、赵小琪、肖向东、谢廷秋、秦方奇等。姚老之子、姚雪垠研究会会长姚海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表示将与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姚雪垠研究会为平台,将姚雪垠研究更深入地进行下去。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永健(华中师范大学)回顾了中国新文学学会走过的30年发展历程,特别回忆了姚雪垠对学会的筹建、成立以及发展壮大所做的各项工作,认为姚老不愧为“文坛巨匠,青年导师”。

读者
评论

“语文回归”比“鲁迅大撤退”更值得思考

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多篇作品被删除,广东版则将《药》换成《祝福》。而巴金反思“文革”的文章和余华的小说则被新选为课文(《广州日报》9月8日)。从“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有所删减”到“鲁迅作品从语文课本中大撤退”,即使是每一次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热议。支持“删减鲁迅作品”的人认为,在内容上,鲁迅的作品相对过时和落伍;在比例上,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比例确实太大。反对“删减鲁迅作品”的人往往都会引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可悲。”

其实我们稍加沉淀,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近几年,“去鲁迅化”就像癌症,总是间隔性爆发,而这又是与“俗化鲁迅”的思潮相伴的,甚至有人鼓吹“只读周作人,不读周树人”。在“神化鲁迅”与“俗化鲁迅”的激荡中,语文并没有回归,我们大学生并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鲁迅,并没有实现与鲁迅的平等对话,于是就出现了“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怪现状。我们的语文被异化了,教学不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体验出发,而是为了教育而语文;解读作品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机械地沉溺于对“中心思想”的提炼与解读;看待作家,不是从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完整人生出发,而是在只言片语中随社会思潮而摇摆,要么“微言大义”,要么“只抓虱子”。语文的回归,其实就是要理群教授在《对话语文》中说的“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内心、直面人的生命”。语文不仅要适当地进行“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更要“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